

秦帝国是为中国古代大一统官僚帝国发轫之始，然其“功过五帝、地广三王”之盛转瞬即逝。对其继任者而言，“矫秦之弊”便成为需首先探讨的问题。而汉人对秦的政治批评，在影响上更加深远于后世对前朝的指斥，其因便也在于此，汉人对秦帝国的谴责所致政治变迁深刻影响到了两千多年帝国政治文化的基本形态。

启发于现代社会科学，可将秦汉间法术、道术和儒术做如下阐述，儒术更具意识形态性质，道术则显政治哲学色彩，法家专制官僚政治行政理论。来源上，道术取法“至德之世”，即为原生社会状态，儒家主张“复古”，乃取法尧舜与三代，法家力主变革，重在当世。由此导致“文质”关系之论辩，进而及于对不同政治角色的推崇。

战国秦汉国家规模体制复杂，朝堂各学士基于自身立场提出不同治国之方，渐渐演变成指导思想的出现。由此诞生一种行为每每要与某家之术联系起来的独特现象。

汉初之时，兴黄老之学，承秦制而“无为”，为秦后千疮百孔的社会提供修养生机的机会。其因可分为：一为其相比秦缺少的统一海内之巨大功业的进取精神，统治者强烈权欲等因素故迫使在固有弊端下，使官僚机器运转放至最缓，尽量减少承担之事务，是所谓“少做少错”。二为虽是遵循道家无为之准则，然在实际上激烈的改革亦是难以在时下进行的，是故满足于让下级政府事从常规，用秦之人（秦政权残留或按此种常规训练而出）可保社会平稳发展，后图建业。三为孝文帝、窦太后等人影响，孝文帝以为儒家繁礼饰貌无益于治、当躬化节俭，薄葬轻服，而道家之学正合此道，窦太后以为儒者文多质少，多任用黄老之术治国官吏。四为汉初多武力功臣，少文多质，崇尚“木拙于文辞”，简约而“易行”的无为政治颇为契合汉初统治集团。

对黄老之学的阐述，司马谈言之“其实易行，其辞难知”。黄老之学所推崇者非“法治”之能吏，亦不同于“礼治”之君子，而为“重厚长者”。汉初政治实践上强调“治道贵清静”，一反文吏“进取苛察”，二反儒生“繁礼饰貌”，所谓“长者”代表的是清静放任的黄老政治精神。

及至武帝时，重新活跃的官僚帝国体制，展露出对于领土扩张、财政富足、法治秩序、国家干预等方面诉求，然其代价是为社会再次陷入凋敝与动乱。后世并提秦皇汉武，其相似根本上源于官僚帝国体制内在倾向性。所谓秦“失之在政，不在于制”，当“无为”之“政”不足以抑制“制”传承带来的重新出现类似秦“政”的特征倾向时，也便自然失去“指导思想”的地位。